

The master
who taught my soul
to sing

教我灵魂歌唱 的大师

艾略特
奥登
希尼
茨维塔耶娃
曼德尔施塔姆
阿赫玛托娃
帕斯捷尔纳克
布罗茨基
里尔克

.....

诗篇，乃出自一种必然。在他的早年，他曾幻想了“茵纳斯弗利岛”那样一个“遥远的家园”，
拜占庭城堡神火的锤打之中。

该诗体现了他对自己矛盾复杂的一生进行“锤炼统一”的不懈努力，也显示了其炉火纯青的高超诗艺和语言功力。

从翻译的角度看，一个“拍手作歌”的灵魂不是来到拜占庭的城堡里，
在卓越的语言劳作中，一个诗魂得以“分娩”、再生，
在“每个裂缝唱得更响亮”的时刻，也是原作的生命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的时刻。

王家新

教我灵魂歌唱 的大师

艾略特
奥登
希尼
茨维塔耶娃
曼德尔施塔姆
阿赫玛托娃
帕斯捷尔纳克
布罗茨基
里尔克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王家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大家读大家)

ISBN 978-7-02-012510-4

I. ①教…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0378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6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页 1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510-4

定 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叶芝：“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	1
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	
——艾略特的《荒原》及其反响	19
奥登：“我们必须去爱并且死”	37
“来自写作的边境”	
——希尼与我们时代的写作	64
她那“黄金般无与伦比的天赋”	
——我心目中的茨维塔耶娃	79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及其命运	107
“你将以斜体书写我们”	
——阿赫玛托娃画像	130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与小说	161

“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天才诗人布罗茨基	182
“诗的见证”与“神秘学入门”	
——从米沃什到扎加耶夫斯基	200
里尔克：“大地的转变者”	228
策兰：创伤经验，晚期风格，语言的异乡	244
“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	
——纪念诗人特朗斯特罗姆	275
夏尔：语言激流对我们的冲刷	
——勒内·夏尔诗歌	287
“绿啊我多么希望你绿”	
——洛尔迦的诗歌及其翻译	300

叶芝：“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

—

W. B. 叶芝 (1865—1939), 现代爱尔兰著名诗人、剧作家, 1865 年 6 月 13 日生于都柏林, 父亲为画家。三岁时全家迁往伦敦, 1880 年搬回爱尔兰, 1981 年叶芝在都柏林上中学, 后在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其间开始发表诗作, 并对神秘主义产生浓厚兴趣, 1889 年出版诗集《乌辛之浪迹及其他诗作》, 许多诗作就取材于爱尔兰神话传说的“大记忆库”。

1889 年, 叶芝结识了女演员茅德·冈, 一位热衷于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神秘而充满激情的女性。茅德·冈对叶芝的一生都具有重要意义, 叶芝曾多次向她求婚, 均遭到拒绝, 尽管如此, 他们仍保持着密切联系, 叶芝为她写下了众多传世的诗篇, 并以她为原型创作了诗剧《凯丝琳女伯爵》。

1896 年, 叶芝结识了剧作家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 并

和她及其他作家、艺术家共同发起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1904年底,叶芝和剧作家约翰·辛格一起参与重建了都柏林艾比剧院,使该剧院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重要阵地,他本人的剧本创作生涯也和该剧院长时间联系在一起。

叶芝在这一时期创作出版有诗集《苇丛中的风》(1899)、《在那七片树林里》(1904)、《绿盔及其他》(1910),在一首《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中他宣称:“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沈睿译)1913年,叶芝在伦敦结识了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并在这位“文学助手”的促动下,在创作上转向一种更坚实、敏锐的现代主义,这种风格上的变化和完成体现在诗集《责任》(1914)、《柯尔庄园的野天鹅》(1919)中。1917年10月,叶芝与乔治·海德·利斯结婚,婚后他买下了巴列利塔作为夏季住所。这座残破而神秘的塔堡及塔内旋梯,成为他诗歌中的重要意象和象征。

在20年代前后,叶芝无可避免地受到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动荡局势的影响,“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这句广被引用的诗,体现了他对一个混乱的、充满了各种冲突的时代的敏感和痛楚。1916年复活节起义失败后,他写下了他的史诗般的作品《一九一六年复活节》。1921年,爱尔兰获得自治,次年,叶芝被选入爱尔兰参议院。1923年,因为“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叶芝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1925年，叶芝出版了神秘学著作《灵视》，他构造了一套超验的象征主义体系，因为他相信他自己和他的民族拥有一份“灵视的天赋”。在其后期，他以一种罕见的创造激情（他曾说过在他年轻时他的缪斯是老的，而当他老时他的缪斯却变年轻了），对心灵和诗歌进行重新整合，以把破碎的人生和艺术经验熔铸为一个整体。其晚后期诗集有《迈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蹈者》（1921）、《塔堡》（1928）、《旋梯及其他》（1933）、《新诗》（1938），代表性诗作有《丽达与天鹅》《马戏团动物的逃亡》《驶向拜占庭》《在学童中间》等，它们为叶芝一生的艺术总结。

晚年的叶芝身体衰退，1938年在腺瘤手术后到法国休养，1939年1月28日在法国曼顿逝世。他的最后一首诗作是以亚瑟王传说为主题的《黑塔》，充满了一种海风狂吹、令“老骨头”不停战栗的力量。1948年9月，依照诗人遗愿，诗人的遗体被移葬在他的故乡斯莱果郡。其墓志铭是晚年作品《本布尔本山下》的最后一句：“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骑士，策马向前！”（“Cast a cold eye,/on life, on death,/horseman, pass by!”）

二

叶芝是一位深刻影响了数代中国诗人的诗人，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都可以感到他或隐或显的“在场”。

对于我们这一代在“文革”之后上大学的文学青年来说，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产生的影响，怎么说都

不过分。我就是从那上面第一次读到瓦雷里、里尔克、叶芝、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最初的相遇往往最珍贵，我不仅从中经历了一场现代主义艺术洗礼，对于刚刚走上诗歌之路的我，无疑是一种照亮和提升——尤其是袁先生所译的叶芝，让我看到了那颗照耀着我的星。

在袁先生所译的叶芝诗中，深深影响了我的的是《当你老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这两首。读《当你老了》，一读就意识到它已“提前写出了”我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两句使我深受震动，仿佛就是在那一瞬，有某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为我出现了，而它的出现提升了我，也照亮了我。

至于《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所体现的高贵、明澈和精英的气质，还有那种挽歌的调子，也深深打动了，“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疼心”，真可谓一字千钧！在诗的第三节，一个步履蹒跚的诗人在回想遥远的过去，而那也是个美丽的黄昏，“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还有什么比这更动情的译文吗？我甚至感到，在袁先生翻译叶芝这首诗时，他把他自己的一生都放进去了。

如果说叶芝早期带有一种感伤、朦胧的诗风，他后来的诗不仅闪现着“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变得更坚实，更有个性了。到了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叶芝说他在庞德的帮助下“从现代的抽象回到明确而具体的所在”。《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就印证这一点。诗中那种历历在目的刻画，那种语言的清澈和透亮

（“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五十九只天鹅浮游”），对我们告别青春期写作以及此后的艺术转变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因为读了这样的诗，我们必须像叶芝说的那样“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也正因为这种相遇，一个伟大的诗人从此永远进入到我的生活中。1992年我初到伦敦，一去我就寻访叶芝当年的踪迹，并买来了叶芝的诗集及回忆录阅读。也正是在伦敦那些艰难而孤独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叶芝》：

我再一次从书架上取下你的书
端详你的照片；
你诗人的目光仍洞察一切
使人忍不住避开

我投向大街。
（我们在逃避什么？）
你终身爱着一个女人
也仍在这个城市走着，——
你写出了她
她就为此永远活着。
在英语里活着
在每一道激流和革命中活着。
她属于尘世。
但她永远不知道她那双激情的

灰蓝色的眼睛
属于天空。

这就是命运！
这已不是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这是无法象征的生活。
折磨一个人的一生。
这使你高贵的目光永不朝向虚无。

于是你守望着整个大地——
像一道投向滚滚流放的目光，
像承受一种最啮心的火焰，
像是永不绝望的绝望。

诗写得比较简单一些，但这就是我在那时的心境。在伦敦北部居住期间，每次到住地附近的“林边公园”露天地铁站等车，看到那些黑色树梢和飞掠的鸦群，我都想起叶芝《寒冷的苍穹》一诗那个著名的开头：

Suddenly I saw the cold and rook-delighting heaven
That seemed as though ice burned and was but the
more ice

突然间我看见寒冷的、为乌鸦愉悦的天穹

那似乎是冰在焚烧，而又生出更多的冰。

在巨大的寒意中，诗人不仅瞥见了为乌鸦愉悦的天穹，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冰”在天穹深处“焚烧”而又“生出更多的冰”，这真是写出了一种天启般的景象！

关于此诗，据说是叶芝闻讯茅德·冈与他人成婚，在精神上经受重创后所作，但无论创作背景如何，这两行诗正如诗人谢穆斯·希尼所说“是对意识的震颤，对斯蒂文斯所说的‘精神的高度和深度’的全部尺度敞开的一瞬间的生动记录。诗行间的震荡戏剧化了刹那间的觉悟。没有藏身之所，人类个体生命在巨大的寒意中得不到庇护”^①。

对我来说也正是如此：这样的寒冰焚烧的天穹不仅具有彻骨、超然之美，它更是一种对诗人的激发，是丰盈生命的映现，它会唤起我们生命中一种“更高认可”的冲动。它在震颤我们的同时也激发着我们去呼应它。

我一次次默念着这样的诗，因为它使我走出令人沮丧的现实，而把自己置于一种更高的精神尺度下。我感激叶芝，因为这是一位永不屈服于人世的平庸和无意义的诗人。“智者保持沉默，小人们如痴如狂”，这又是他的一句曾“刺伤”过我的诗。但是，也正是在时代的混乱中，他写下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等众多伟大诗篇。我难忘在翻译《雕塑》一诗时所经受的激励。

^① 谢穆斯·希尼：《欢乐或黑夜：W. B. 叶芝与菲利普·拉金诗歌的最终之物》（姜涛译），《希尼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诗人首先从受惠于毕达哥拉斯黄金分割律的大理石或青铜雕塑开始,进而反思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最后又回到了给诗人以终生影响的 1916 年复活节起义,至此,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出现了:

当皮尔斯把库弗林传召到他的一边时,
什么样的步伐穿过了邮政总局? 什么智力
什么计算、数字、测量,给予了回答?
我们爱尔兰人,生于那古老的教派
却被抛置在污浊的现代潮流上,并且
被它蔓延的混乱狂暴地摧残,
攀登入我们本来的黑暗,为了我们能够
去追溯一张用测锤量过的脸廓。

皮尔斯和库弗林都是殉难的英雄,邮政总局为起义事发点。在事过 20 多年后,叶芝再次为这次历史事件所迸发的光辉所笼罩。如同诗中所写,这已是一个为任何智力、计算和测量都无法解答的精神事件。正是这次起义,使爱尔兰民族精神达到了一个“英雄的悲剧”的高度,使晚年的叶芝,在面对死亡的逼近时却朝向了一种更高的肯定。饶有意味的,是“攀登入我们本来的黑暗”一句中的“攀登”(climb)一词,它有力地逆转了“堕入黑暗”之类的修辞成规,不仅显示了一种向上的精神姿态,也使“黑暗”闪闪发光起来。这就是说,“黑暗”因为“攀登”一词而成为了一种“高度”:只有置于这样的尺度下,一个诗人才有可

能“追溯一张用测锤量过的脸廓”，亦即显现出为伟大文明和信仰所造就的生命。

叶芝最终达到了这样的肯定，这使他的诗超越现代的混乱和无意义而向“更高的领域”敞开。这正是他非凡的力量所在。因此艾略特会这样感叹：叶芝在“已经是第一类（指‘非个人化’）中的伟大匠人之后，又成为第二类中的伟大诗人”。

这些，对我们在那个年代都产生了重要的激励。1994年初我回到北京，命运仍没有变，只不过它变得更荒谬了：一个全民“下海”的时代席卷而来（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那一句“变了，全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诗人们不得不在一个边缘上坚持或放弃，甚至，我们不得不在自己身上经历着人们所说的“诗歌之死”。

但是，也正因此，我要感谢像叶芝这样的伟大诗人，是他们帮助我从时代的暗夜中一直走到今天。1995年，我接受东方出版社的邀请，编选三卷本的《叶芝文集》，除了联系一些译者翻译外，我自己也翻译了20多首叶芝的诗。叶芝中晚期诗歌所体现的那种“精神英才的伟大劳役”，再一次深深地搅动了。《黑塔》为叶芝一生最后写下的诗作之一，以下是它的一节副歌：

坟墓里死者依然笔直站立，
而风从海边阵阵刮来，
他们战栗，当狂风咆哮，
老骨头在山岗上战栗。

在翻译时,我所经受的身心战栗真是难以形容。它告诉了我什么是一个诗人“黑暗而伟大的晚年”,什么才是我们历尽生死才能达到的境界。它也使我感到,正是像晚期叶芝这样的顽强不屈的“老骨头”的存在,使现代诗歌“英雄的一面”在今天依然成为一种可能。

当然,随着时间的进程,我们还不断从叶芝诗中发现新的东西。在早年的印象中,叶芝是一个激情的、痛苦而高贵的抒情诗人,但后来我还感到了一个“双重的叶芝”,一个严格无情的自我分析家,一个不断进行自我争辩的反讽性形象。而他中后期诗歌中的力量,往往就来自于这种矛盾对立及其相互的撕裂和撞击。歌德当年曾说过“爱尔兰人在我看来就像是一群猎狗,穷追着一只高贵的牡鹿”,而叶芝对此甚为欣赏,并在日记中用来加以自嘲。然而,在这样的反讽中我们感到的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而非意义的消解,是一个诗人所达到的精神超越而非角色化的自恋。叶芝的诗之所以能对我产生真实的激励,就因为他在坚持“溯流而上”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复杂的自我反省意识。换言之,这种叶芝式的“英雄化”之所以可信,正如福柯在谈论波德莱尔时所表述的那样:“无须说,这种英雄化是反讽的。”

重要的是,叶芝就像他自己所写到的那样:“但人的生命是思想,虽恐怕/也必须追求,经过无数世纪,/追求着,狂索着,摧毁着,他要/最后能来到那现实的荒野……”(《雪岭上的苦行人》,杨宪益译)。这种彻底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在后来的写作也

产生了深深的激励。如他晚期的名诗之一《长腿蚊》，全诗有三节，描述历史或歌咏神话，而每一节的最后都是“像水面上的一只长腿蚊，/他的思想在寂静中移动”。“长腿蚊”的意象出现得出乎意料，但又恰好与每一节的“正文”构成了反讽性张力。欧阳江河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长腿蚊这种寂静的意象对北岛后期诗的启示，无独有偶，翟永明的《我策马扬鞭》一诗也化用了叶芝的诗句：“在静静的河面上/看呵，来了他们的长腿蚊。”这个最后被引来的长腿蚊，和上面的“我策马扬鞭”骤然间也构成了一种张力。

这就是晚年的叶芝对我们的启示。他的诗独具的力量来自一种不懈地“为凤凰找寻栖所”的努力，也来自于一种人生矛盾的相互撕裂和冲撞。他一直坚持对一个永恒世界的塑造，而又始终以现实和心灵的苦汁为营养。在他后来的诗中，他愈来愈深入地涉及人生的难题和矛盾。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借他的《马戏团动物的逃奔》中的诗句“既然我的梯子移开了/我必须躺在所有梯子开始的地方，在内心那破烂的杂货店里”来描述 90 年代以来经历了一场历史震荡后的中国诗人的写作。我想这就是历史的“造就”：它移开了诗人们在以前所借助的梯子，而让他们跌回自己的真实境遇中，并从那里重新开始。

三

以上谈到的是叶芝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如果真要

展开“叶芝在中国”这个话题,还得从卞之琳、穆旦、袁可嘉等前辈诗人译者说起。穆旦在40年代初创作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等饱含民族忧患并带有“复调”性质的诗篇,显然就受到叶芝《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巨大感召和影响,而他多年后在“文革”后期那种艰难环境下对叶芝、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翻译,不仅体现了一个饱受磨难的诗人对“早年的爱”的回归,而且,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翻译,他再次把自己“嫁接到那棵伟大的生命之树上”。穆旦晚期《智慧之歌》中所包含的“叶芝式的诗思”,我在一篇文章中已有所论及;诗人自己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坦言他在《冬》一诗中是怎样采用了叶芝的“迭句”的写法。但我想,重要的还不在于具体的技艺,在于他从叶芝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把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与一种反讽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同时也与一种悲剧的力量最终结合在了一起。穆旦在那时对英国现代诗的翻译及其创作,成为他生命最后所迸放的一道最令人惊异的光辉。

也正因为如此,我要再次表达对这些前辈诗人译者的深深感激,因为不经过他们那优异的翻译,叶芝就有可能被我们错过,也不可能对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穆旦对奥登的《悼念叶芝》的翻译,不仅饱含了他自己对一位伟大诗人的感情,而且把这种翻译本身变成了一种对诗歌精神的发掘和塑造。说实话,很多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叶芝的“诗人形象”,就来自于穆旦这篇卓越的译作。至于叶芝自己的诗,穆旦译有《一九一六年复活节》和《驶向拜占庭》。穆旦对《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这篇纪